

读史阅世

泉郡关帝文化肇始考

□ 靳风华 罗辉焄

阅人遗事

陈锡襄与民俗学运动

□ 杨文军

关帝信仰自中原传入闽越地区,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早已成为闽南区民众心中重要的地方神,并被赋予了保护神、武财神等功能而存在,其庙宇数量在闽南也位于前列。据《泉州府志》统计,在鲤城区、丰泽区和洛江区中现存或重建的关庙就有22座,而原有的关庙32座,约占泉州市区道教与民间神庙数量的百分之四。这在祭祀着240余位尊神的泉州区域,可谓是名列前茅,也可以看出关帝文化在泉州错综复杂的宗教文化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入闽的隋唐“军神论”

关于泉州关帝庙宇的建庙缘起时间节点一直众说纷纭,其中有三种说法传播最为广泛,首先便是“军神论”,有闻关羽最早是在唐朝时期作为“军神”,随着军队的征战而从中原地区传播而来。

据《闽书》卷四十记载:“(陈)政以从征功,拜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金乞镇守,以靖边方。高宗敕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绥安故地。”其中,陈政将军率领将士平定“蛮獠啸乱”,维护了唐朝漳州地区和平,因此有学者认为此时的关羽有可能是作为将士们心中象征着武勇、忠义精神的“军神”被从中原地区带来的。

但是,根据史料记载,在隋唐时期的关羽的形象和地位并未确立。据《蜀先主庙记》记载:“(先主)崇于故里,甘皇后配位于神座之中,诸妃嫔图形与旒旌之后,孔明孝直股肱,皆列于东厢,关羽、张飞爪牙,悉标于西庑。”可知这一时期的关羽仅仅作为功臣配祀于蜀先主祠,并且在唐朝所建立的武成王庙中仅仅是作为六十四位从将中的一员。甚至据《五代史》中描述,此时关羽的祭祀供奉还是蔡同文奏请“武成王庙壁诸英贤画像面前,请各设一豆、一爵祀享”后才享有,可以看出其地位在当时相当不突出。

结合这一时期民间传说记载,关羽的形象尚未祛除“鬼魅”之影,其中唐宋时期较为出名的“关羽厉鬼说”便是宋代时期孙光宪《北梦琐言》中提到的“唐咸通乱离后,坊巷传言关三郎鬼兵入城,家家惊悚”。虽文中记载为讹传,但是不难看出,在隋唐时期的关羽

并未成为人们心中的神将,因此祭祀供奉更无从谈起。

结合唐朝时期的关羽形象的史料记载可知,这一时期的唐朝廷与民间对于关羽的关注度远不如蜀先主,关羽仅仅作为祭祀当中的从属而被立于庙堂之中,甚至在民间传说的形象尚有惊悚恐惧之意,那唐代就以“军神”一职而闯入闽地这一说法应当被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

或许关羽起先确实是作为“军神”随军由中原而传入闽地,但是在唐时期就已经成为“军神”并被将士带入闽地建庙祭祀这一说法无疑是值得质疑的。

宋泉郡关羽文化发端

关于关公庙宇在泉地建造时间节点还有第二种说法,即应当起源于宋朝。

其一,由宋史得知,宋哲宗时期赐额“显烈”,宋徽宗时期赐封关羽为“忠惠公”,进而封为武安王,这一时期的关羽在官方中的地位已经实现了由鬼及王的跃迁,并且在许多文献资料都记载有北宋大中祥符初年关羽战蚩尤的传说,如元朝成书的《关王事迹》中记载的“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解州盐池水减,亏失常课。……于是召天师赴阙,上与之论蚩尤事,对曰:此必无可忧,自古忠烈之士,没而为神,蜀将军关某,忠而勇。陛下祷而召之,以讨蚩尤,必有阴功。……移时,一美髯人擐甲佩剑,浮空而下,拜于殿庭。……仍命有司修葺祠宇,岁时奉祀”。

宋时盐政收入份额一度占据了朝廷的一半,解州盐减势必影响了当时整个国家与社会的运转,因此当地百姓躁动不安,道教借此杜撰关羽战蚩尤的故事,而崇尚道教的宋真宗顺势建祠宇祭祀关羽,虽然这一传闻充满了怪力乱神之味,但是佐证了中原的关羽祭祀在宋代就初现雏形。此外,南宋时期,帝王又两次加封关羽,在《天府广志》明确记载了宋孝宗对于关羽的褒奖:“生立大节,与天地以并传;没为神明,亘古今而不朽。”所以,在帝王的加持和当时社会主流文化的推动下,关羽的寺庙在各地兴起也在常理之中。

此外,宋朝时关羽文化是否已经被传入泉州这一问题,或许结合宋朝时期的社会迁

徙和泉州境内的一些碑刻遗迹便能厘清一二。据清乾隆《泉州府志》“坛庙寺观”记录:“忠义庙,在府治东凤山麓。宋绍兴间(1131—1162年)宗室赵汝锡建。旧祀汉关公羽,唐张公巡、许公远。后增祀宋岳公飞、文公天祥、陆公秀夫、张公世杰、苏公斌、赵公昂发。”

而根据《宋史》卷一六四记载,北宋末年宗室为躲避战乱南迁,负责管理外宗室的西、南外宗正司经过屡次迁徙,最终定居福建,其中西外宗正司迁于福州、南外宗正司安置于泉州,而文中提及的赵汝锡可能就是镇王赵元偃七世孙,在靖康之乱后便同南外宗正司移居至泉州。

此外,笔者经实地调研后发现,现存于泉州境内的关帝庙中,至少有两座可以寻到宋代的历史构建,一为位于南安市的南邑关帝庙正殿中的覆盆式梭柱,另一为石狮蚶江忠仁庙侧的宋代石经幢。根据蚶江忠仁庙《重修忠仁庙碑记》记载,庙始建于南宋祥符元年(1278年),晚于东凤山麓的忠义庙。同时,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和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两次加封关羽,将其地位提至王位。

因此,基于南宋帝王的大力扶持和社会主流文化的倡导,泉州于宋代开始建造关帝庙,祭祀关羽也变得十分合理。

泉州关公庙“明兴论”

最后一种说法是“明兴论”,即部分学者认为在泉地关公庙宇最早建立应当于明朝初期。原因其一为福建省内记载明代以前的关公庙的历史资料寥寥无几。

其中,《八闽通志》所提及的关羽庙仅两间,一元一明无宋建,而民国年间成书的《福建通志》记录了福建省内89所官方祭祀的关帝庙,仅有两座关帝庙明确建造于宋代但皆非泉州境内。因此,有学者提出在宋时泉州可能不存在关帝庙。

但是,《八闽通志》中仅仅记录了两座关帝庙,而明确建造于明弘治以前的泉州境内关帝庙,如通淮关帝庙、东园龙潭庙和崇武关帝庙也无提及;《福建通志》中记录的89所关帝庙中,虽然仅有两座宋代的关帝庙,但是其中38所未知建造年代的庙宇未尝不存在宋代或元代的关帝庙的可能。因此,一刀切地认为没有明确年份记载的关庙就非宋代及元代的

关庙明显是不合理的。同时,明清时期历经倭寇侵袭及迁界,无数庙宇毁于一旦,而《福建通志》成书于民国时期,因此若以此为据,证明宋代泉州境内无关庙尚失妥当。

其二认为泉州的关帝庙宇可能始于明初的卫城建立。明初倭患愈演愈烈,因而明太祖派遣江夏侯周德兴入闽整顿海防,在泉州、厦门永宁等地修建了16座卫城。根据《东山县志》记载“国朝洪武之十二年(1379年)城铜山,以防倭乱,刻像祀之,以护官兵,官兵赖之”,可以看出卫城的建立对于福建区域的关帝庙的发展确实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作为镇守重地的泉州城此时建起关帝庙也十分合理。同时,根据崇武《重修武庙碑记》记载“神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自王畿郡邑以逮山陬海,无不崇奉,武城关帝庙建于明初,越今几数百年”可知,明朝初年,泉州境内就已经有了关帝庙的建立。

不得不承认的是,至今为止能够证明泉州境内有明初以前的关庙的文献暂时没有,仅有的只是某一庙宇中明朝之前的历史构建。由于资料的缺失和遗迹的损坏,目前暂且只能确定关帝文化兴起的时间节点在明嘉靖前后,正如《晋江县志》中记载李光缙描述明代时的关帝崇拜的盛况:“上自监司守令居是邦者,迨郡守绅士,红女婴孺,无不人人奔走,祷靡不应,应靡不神,先是某从父相国云泉公为记庇壁,光缙获弓褐之祷于侯。”而这与漳州的石马镇上马、下马关庙及漳州府绿鳌屿的关帝赛迎神会兴起的时间节点重合。因此,关于关帝庙建造的初始时间只能限于两宋之交之际至明朝初年期间,或许随着后续的调研和考古发现,能够将其缘起时间辨得更加确切具体。

总而言之,探讨关羽文化入闽的开端,实则是在探讨中华文化传播途径和历史演变。关羽崇拜能够在宗教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甚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代言人,这是许多历史人物望尘莫及的,而其中体现出来的人文精神、人世理念是中国神崇拜的共同之处,在千年的时间里,一直向国人和海外传播着中国自古以来的果敢、忠义的灵魂内核。因此,研究关羽文化不仅仅是研究民间信仰,更多的是研究背后所蕴含的时代因素和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

艺苑大观

清末福建传统漆器的龙纹装饰

□ 张小燕 肖致远 文/图



龙凤呈祥主题纹样



龙凤共舞主题纹样

蛟龙在荷主题纹样



云龙纹样

清末福建传统漆器色泽光亮、轻巧坚固,在中国古代漆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一时期,福建工匠们巧妙地将龙的形象融入漆器制作中,创造出了丰富多彩的装饰效果,其中主要包括云龙纹、龙戏珠纹、龙凤纹、蛟龙纹等。

统吉祥图案。《山海经·海内经》记载:云龙被视为东海之神的化身,属于四大海龙之一。该纹样作为清末漆器中比较常见的一种装饰,应用范围几乎涵盖整个日常用品,包括瓶、盒、盘、茶具、碗具、梳妆盒和文具等。此纹样起源于唐宋五代时期,最初出现在瓷器上,以龙为主导、云彩作为衬托。在唐代,它已是皇家贵族象征的重要纹饰。

福建博物院收藏有一件清乾隆年间的清雕漆云龙纹盒,该盒高12厘米,直径34厘米,木胎所制,为国家二级保护文物。这件盒子分为两部分,且形状上下对称,外表采用剔红技法雕刻而成,盒顶与内部涂有黑漆,盖顶和侧面用云龙纹样装饰。其中龙身扭曲多变,以尖锐的双角和五爪突出,肘部毛发分三叉,尾部呈羽扇状排列。数条龙在如意形状的云朵中自由游走,营造出一种腾云驾雾的效果。根据《论衡·卷十六·乱龙篇》中所言:“董仲舒《春秋》之雾,设土龙以招雨,其意以云龙相致。”这表明云龙与“呼风唤雨”的能力有着密切的联系,也逐渐演化为象征飞黄腾达和步步高升的美好愿望。

龙戏珠的图案多见于壁画、刺绣、雕铸、瓷器、漆器等传统工艺品上。福建沈绍安漆艺博物馆所收藏的龙纹印锦盘,直径23.2厘米,边厚2.8厘米。这件作品出自“兰记”厂家品牌之手,是通过将传统脱胎漆器工艺与雕刻技术相结合的“印锦”技法制作而成的。盘面上饰以金漆,色泽流光溢彩。盘中三条龙以C形的曲线在云层

中穿行,巧妙地分隔出盘面的三个区域,底部以交错排列的钱币图案为背景,营造出“游龙戏珠”的生动场景。每条龙都头昂尾举,胡须锋利向下,双眼突出。其中,一条龙口中喷出浪花,象征着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祥寓意。

在福建传统漆器上,龙戏珠纹经常与云纹、凤纹、海水纹等纹饰相结合,用于强调龙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互动。福建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清末民初脱胎青退漆金龙花瓶,高34.5厘米,底径10厘米,质地为脱胎,为国家三级保护文物。瓶身以青黑色漆为底,覆以金漆,采用回形纹分隔图案。瓶身上的两条龙,造型生动,体态自然弯曲,眼神锐利,嘴巴大张,爪子锋利有力,鳞片细腻丰富,加上腾云装饰,显得十分威严。在双龙中央饰以带有火焰纹样的宝珠,其上方绘有落在云彩的太阳图案,象征光明。下部的龙吐水造型则更加活泼有趣,龙的表情与人类五官相似,额头上的肿块突出,毛发飘逸,四肢和爪子夸张,吐出的水如花朵般向外扩展。

以龙凤呈祥为题材的纹样在福建传统漆器中也不少见。福建沈绍安漆艺博物馆收藏的描金龙凤捧盒,胎体为木胎,直径为30厘米,高度15厘米,外部以黑漆为底,再使用描金、螺钿工艺装饰技法,呈现出色彩鲜明的视觉效果。盒面精细绘制了龙凤纹:龙形威严肃穆,小眼却神采奕奕,旁边绘有牡丹,象征富贵;凤形优雅端庄,颈长眼细,翅羽和尾羽细节丰富,尾部三叉。盒中心绘制“火珠”,周边云纹环绕,侧

面则以锦纹、祥云纹加以点缀,底部有“大清康熙年制”字样。这种龙凤纹被寄予对新婚夫妇和谐美满、子孙满堂的美好祝愿。

清末福建传统漆器中,蛟龙纹是最具有特点、稀有的装饰纹样。《后汉书·张衡传》中记载:“伏灵龟以负坻兮,互蛟龙之飞梁。”这说明其体长可与桥梁相媲美,显示其纤细修长且体型庞大的特点。福建沈绍安漆艺博物馆中珍藏的青金蛟龙镇纸,木胎所制,长23.5厘米,宽2.8厘米,高3.5厘米,为沈绍安“兰记”作品,运用雕刻和脱胎技术,覆盖金漆,使蛟龙造型金光闪闪。作品中,蛟龙盘旋于镇纸之上,龙头置于中央,尾巴延伸至两端,眼睛为橄榄形,整个龙身被抽象化和简化。

(作者单位:福建理工大学设计学院、福建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研究基地设计创新中心)



双龙戏水主题纹样

陈锡襄(1898—1975年),别名息响、式湘,出生于福州市南门外浦下村(今盖山乡浦下村),排行第三,儿时聪明伶俐,十分好学,中学毕业后,家人全力支持其一人上大学。他曾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旁听经济史三年,博闻强识,涉猎广泛,也曾参与重庆筹备中国民俗学学会事宜,是我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与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近代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民主爱国人士。

1921年,他毕业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哲学专业;1924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研究生毕业;1924年—1927年间任教于私立福建协和大学;1927年,离开福建协和大学到国民革命策源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并从事民俗研究,而后任浙江大学文学院国文讲师、副教授;1975年10月18日去世前,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

陈锡襄发起并参与民俗学运动主要在北京、广州、福建,同庄泽宣、黄仲琴诸先生一样,都是因个人兴趣或与其所学专业而热心于民俗学。1921年—1924年,陈锡襄在北京大学就读研究生期间,经历并参与了歌谣的研究。1920年12月19日,鲁迅、钱玄同等人在北大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并得到蔡元培等人的大力支持,定期在《北京大学月刊》发表关于“歌谣”的文章。1923年5月24日,第二次筹备会召开,正式宣布“北京大学民俗学研究会”成立。其间,陈锡襄与顾颉刚、容肇祖、董作宾等人在国立北京大学从事歌谣、方言和风俗习惯的研究。

1927年,陈锡襄赴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同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等人,成立“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学学会”。1927年11月1日,创立《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此后刊载不少民俗学方面的文章,如陈锡襄的《调查现代欧化风俗提议》《一部民俗学著作的介绍》《民俗访问记》等。1928年4月10日,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就整理旧书问题召开会议,议决:地方志由陈锡襄负责;哲学、宗教由容肇祖负责;杂书由顾颉刚和杨振声负责。

1928年4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民俗学学会与教育研究所联合开办民俗学传习班。首期学员22人,修业期限为3个月,分别由陈锡襄讲授搜集风俗材料的方法,顾颉刚讲授整理传统的方法,容肇祖讲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经过,余永梁讲殷周时代风俗片段,钟敬文讲歌谣概论,杨成志讲民俗学问题格等课程。其招生章程规定,“功课授完后,即分别给予题目,俾使着手做各种调查整理研究工作”。1929年5月8日,陈锡襄在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第57—59期合刊)上发表了《风俗学试探》一文,探讨了建立民俗学的理论体系,引发很大反响。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